

吉金铸国 礼乐中华

“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展内容策划

为系统转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让公众了解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深厚根脉,陕西历史博物馆自2017年开始筹划“早期中国”系列展览,试图以彩陶、玉器、冶金三重视角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其中,第一部“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展览(以下简称“彩陶·中华”展)和第二部“玉璽·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览(以下简称“玉璽·九州”展),已先后于2020年和2023年圆满完成。

作为“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第三部及收官之作,“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展(以下简称“吉金·中国”展)于2024年年初启动筹划。该展览在时间上接续前两部展览,以青铜冶金技术和青铜文明的发展为视角,继续探讨“早期中国”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以及王朝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经过近一年半的紧张筹备,该展览将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与观众见面。

展览主题和叙事重点

提炼展览叙事主题

如何凝练展览主题是展览内容策划的首要任务。中国青铜文明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其鲜明特征和精神内涵是什么?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及早期中国形成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就是“吉金·中国”展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通过梳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诸多成果,我们对以上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即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以铸铜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加速汇聚,不仅催生出中国独特的青铜文化,也使夏代文明跃升至王朝文明阶段。并在不断地汇聚与辐射、整合与重组中,得到持续加强和巩固。至西周早期,一个疆土广袤、文化趋同的最早的统一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基本形成。由青铜技术所引发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影响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格局,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地理版图和中华礼乐文明的坚实基础。基于此认识,我们凝练出了“吉金铸国、礼乐中华”这一宏大展览主题。

确定展览叙事时间框架

对于历史类专题展览来说,展览叙事的时间框架自然也是展览内容策划的重中之重。根据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涉及的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距今5800—5200、5200—4300、4300—3800年前后分别为古国时代第一、二、三阶段;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吉金·中国”展作为“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第三部,在时间上接续“彩陶·中华”展和“玉璽·九州”展所聚焦的古国时代第一、二阶段,故我们以古国时代第三阶段的开始作为展览叙事时间上限。古国时代第三阶段,正是以铸铜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加速汇聚,并进而催生夏代王朝文明的关键时期,也是“理想的中国”酝酿和逐步形成的重要阶段。

关于展览叙事时间下限的设置,我们将其确定在西周早中期之际,也就是成康之后、“穆王革典”之前。之所以这样确定,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一是从物质发展史和艺术史层面讲,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集中展现了中国青铜技术和艺术的高超水平。西周中后期,青铜器面貌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即所谓的“中期质变”。二是从政治和文化层面讲,西周早期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施行,将以都邑为中心的礼乐文明,强势植入广袤疆土内的众多封国,大大提高了文化融合的效能。“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管理的‘现实的中国’,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和思想基础”。而周人的分封,基本上就是在成康之时完成的。三是从展览具体策划实施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来讲,将展览叙事时间下限设置到西周,也便有了“陕西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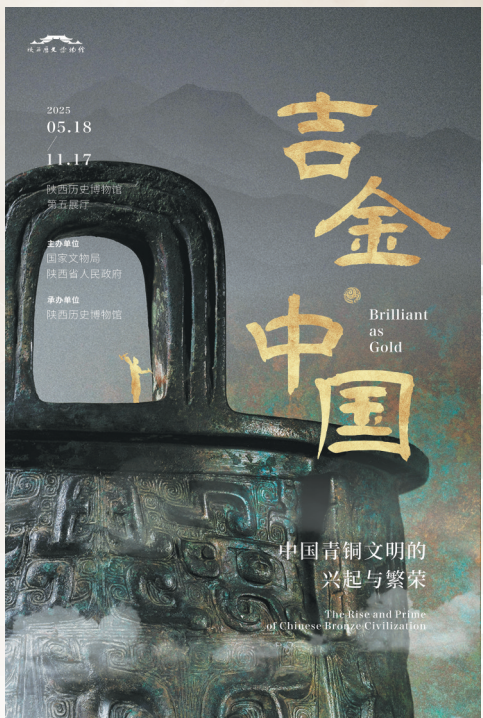
梳理展览叙事重点

在展览主题和时间框架确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展览信息进行了系统梳理,确定了三大叙事重点。

第一大重点是展现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及中国独特的青铜器发展道路。通过青铜器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工艺,表现中国以陶冶范铸为主的有别于其他青铜文明的鲜明技术特征。通过将外来青铜技术与中国传统陶礼制结合创制出的青铜礼器,进而用于维护国家运转和权力运行的中国特有的青铜器发展道路,表现中国青铜文明以“礼”为主和其他文明以“用”为主的不同,从而构建起关于青铜冶铸技术及中国青铜文明的总体概貌,突出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第二大重点是分析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推动力。基于夏代已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中华文明也从无中心的多元一体进入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时期,展览以时间轴梳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发展的特征,从以王都为代表的“中心”和王朝所控制或影响的“四方”两个层面,探讨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和青铜器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展现三代王朝凭借对青铜器核心制作技术以及铜矿战略资源和青铜器分配权和使用权的掌控,持续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着王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突出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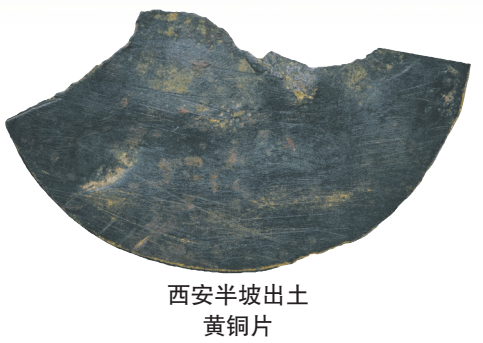
第三大重点是探讨青铜器所承载的礼制观念及在中华传统礼制文明中的奠基性作用。三代时期,青铜器因其卓越的性能成为礼制的最主要载体,并在之前礼制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青铜礼乐文明,诠释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观念,规范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秩序的运行,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坚实基础,并成为核心价值和根本制度被广大区域内的众多族群所认同,突出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展览海报



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出土
铜方鼎



西安半坡出土
黄铜片



陕西石峁出土
铜齿轮形器



甘肃省博物馆藏
四羊首铜权杖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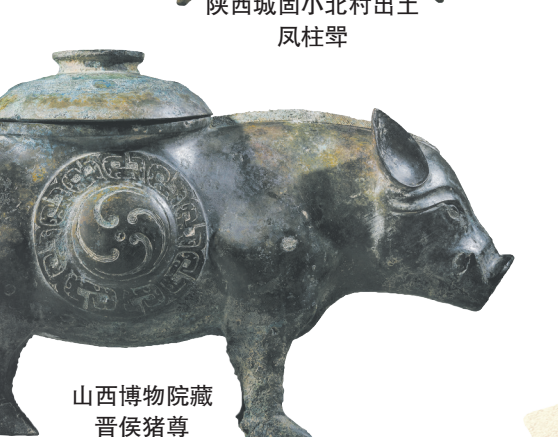
天水博物馆藏
铜牌饰



宁夏姚河源出土
铜爵



陕西西乡小北村出土
凤柱罍



山西博物院藏
晋侯猪尊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中义钟

叙事逻辑与内容框架

在展览叙事上,“吉金·中国”展继续沿用前两部展览“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的叙事逻辑。即通过“是什么”提供基本信息,建立观众对中国青铜器制造和发展道路的初步认识;通过“怎么样”展现三代青铜文明兴起与繁荣的过程,将抽象主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表达;通过“为什么”对青铜文明的核心特质及意义与价值进行解读。在具体叙事上,用三个单元“技术·潮流”“中心·四方”“礼乐·中国”,分别对应“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的叙事逻辑,并同时勾连起展览的三大叙事重点。

第一单元的“技术·潮流”,分为“范金合土”和“青铜之路”二章。其中,第一章“范金合土”又分为“何为吉金”和“陶冶范铸”两节。介绍了青铜的概念,青铜器从开采冶炼矿石到制模作范再到铸造成器的全流程,重点展现了中国创制的泥范块范法工艺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铸造为主的传统技术基础。第二章“青铜之路”分为“铜华初萌”“礼用分途”和“礼器成群”三节。其中,第一节“铜华初萌”将目光聚焦在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之前,介绍中国青铜技术在本土的缓慢发展,以及在“东亚青铜潮”影响下逐渐对外来技术进行吸收、改造的本土化进程。第二节“礼用分途”介绍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夏商王朝通过创制出的青铜礼容器,走上了“器以载礼”的发展道路。而中原以外的中国西北及北方地区,则沿用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实用器为主的传统。第三节“礼器成群”介绍商代中期后青铜礼器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相对严整的青铜礼器组合,展现了从商代“重酒”组合到西周“重食”组合的演变,阐释了中华礼乐文明逐渐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进程。

第二单元的“中心·四方”,分为“夏都煌煌”“殷土芒芒”“赫赫宗周”三章。其

信息组团与意义建构

围绕展览主题和叙事重点,合理选择和组织展品,通过逻辑关系使展品组合形成信息群组以有效地支撑展览主题和叙事,再通过展览文字的串联以及辅助展品的信息补充与强化,进而构建起特定的历史叙事和文化认同。

文物组团

本次“吉金·中国”展共展出来自全国17个省(区、市)共51家文博单位的341件(套)展品,划分为49组,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组展品为31件,数量最少的一组为1件。

在展品选择上,进行了严格的筛选,确保叙事不偏离核心。一是尽量选取代表性的文物,如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四羊首铜权杖头、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出土的倒钩铜矛等,反映对外来技术吸收改造创制的新器类,如甘肃、青海等地出土的齐家文化早期铜镜等,以突出体现每章每节的主题;二是尽量选用新资料,如选用近年发现的甘肃张掖西城驿、山西闻喜千金耙和绛县西吴壁等遗址出土的冶金遗址,宁夏彭阳县姚河源遗址新发现的史籍失载的“获”国出土文物,2020年陕西西城固小北村出土青铜器群等,以增强展览的时效性。

在展品组合上,按照特定逻辑对展品进行组合展示。一是围绕同一主题或概念,进行主题型组团;二是通过并置展现差异或联系,进行对比型组团;三是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展现历史演变,进行时空型组团;四是以文物原始用途或社会功能分组,进行功能型组团。逻辑清晰的分组能将复杂主题转化为“可理解的模块”。通过紧扣展览主题和单元主题的大组团(单元级)、小组团(节级)、单件展品的文物组团所形成的金字塔型结构,将有限的单件文物信息从单一变为系统,构建起完整的知识链,从而强化展览叙事逻辑。

层级文本

在构建展览叙事上,层级文本无疑是最核心的工具。通过承担不同功能的各级文本,共同形成清晰的叙事框架,从而引导观众理解展览主题。

本次展览主标题为“吉金·中国”,在宏观上概括展览核心命题,即青铜器与早期中国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叙事提供方向,吸引观众注意力。副标题为“中国青铜



序厅

中,第一章“夏都煌煌”分为“礼出中原”“鼎宅禹迹”两节;第二章“殷土芒芒”分为“商都翼翼”“正域四方”两节;第三章“赫赫宗周”分为“万邦之方”“分封藩屏”两节。分别从三代都城的“中心”层面和三代王朝所控制或影响的“四方”层面体现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青铜器在这一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阐释中心不断强化,王朝对周边控制力不断增强,王朝文明逐渐趋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模式。

第三单元的“礼乐·中国”,分为“敬天法祖”“斧钺征伐”“和合之音”三章。其中,第一章“敬天法祖”分为“礼赞神祖”“礼序人伦”两节,通过具有动物造型、纹饰的青铜器以及青铜器上所铸铭文,展示了青铜器所承载的“礼”之功能,以及从夏商时期的“向鬼神祈福”,向周公制礼作乐后的“明秩序人伦”的功用转变。第二章“斧钺征伐”分为“兵革之利”“杀伐之权”两节,分别从实用和礼制两个层面展示了青铜兵器的优越性能,以及在维护社会秩序、王朝统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章“和合之音”分为“和序天地”“金玉合声”两节,从音乐的功能和以钟、磬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两个层面,展示了青铜礼乐文明的发展进程和在规范秩序、教化人心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明的兴起与繁荣”,表明展览主要内容是讲述中国青铜文明兴起与繁荣的过程,同时将展览限定在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这一时间段,也指出了这一过程促使早期中国最终形成的深层含义,引导观众进入叙事语境。

围绕标题,将展览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围绕一个子主题展开,与主标题形成“总一分”关系。在文本撰写上,分别从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和发展道路、三代青铜文明的发展进程、青铜文明的内涵特质及其影响三个方面对每个单元的核心内容进行宏观概括,形成叙事章节,帮助观众理解展览的结构框架。每一单元之下又分为章、节文本,对单元主题逐级进行细分,使叙事不断具体化。

同时,本着“好的展览文本应有诗词的凝练与论文的严谨”的追求,我们策展团队在文本的撰写上,多次就各级文本的信息层级和必须要呈现的关键信息进行探讨,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层级文本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此外,在语言上,我们更是字斟句酌,多次组织策展组成员进行集体研读,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力求为观众呈现出最好的文本。

辅展信息

辅展作为辅助性展示内容,对于增强叙事、提供背景、引导观众或调节观展节奏等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各部分主题和展品群组,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辅展设计。一是设置图文类展板,补充展品背景、历史脉络、技术细节等信息;二是将展品分为一般、重点和特别重要三个层级,分级进行展品说明;三是针对需要动态展示的信息,设置多媒体类辅展;四是设置互动体验辅展。通过以上辅展信息群组,对展品或展品群组进行补充与解释,填补展品的信息空白,从而使辅展信息与实物展品“虚实共生”,形成“拼图式”互补,共同构建完整叙事。

通过展品、文字、辅展组成的不同类型的信息集群,形成对多层次叙事结构的有力支撑,共同构建起一个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效果的展览体验。让观众对中国青铜文明兴起与繁荣的总体进程有一个比较深入且立体的了解的同时,构建起展览的多层次意义,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主动思考,最终实现展览的教育目的与社会价值。

从“彩陶·中华”到“玉璽·九州”再到“吉金·中国”,我们通过三部原创大展试图系统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也在力图清晰阐释对“共识的中国”到“理想的中国”再到“现实的中国”的精彩故事。但所有的解读和阐释于真实的历史而言,可能都是乏力甚至是错误的。然而,唯有不断地解读和阐释,我们才有可能走近遥远的古人,也才有可能寻找到我们深厚的文化根脉。

(供稿:陕西历史博物馆 执笔:庞雅妮 谷朝旭)